

A stylized landscape illustration. In the upper left, a red sun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black line. Several black outlines of mountains or hill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. In the lower left, a red octagonal sign with a white border and the number '5' is visible. At the bottom, a green horizontal band represents the ground, featuring two white, irregular shapes that look like houses or tents. The title '进军西藏记事' is centered in a black box with orange text.

进军西藏记事

目 录

一、秣马厉兵出新津·····	(1)
二、攀崖凌险翻二郎·····	(11)
三、汉藏一家聚康定·····	(16)
四、古城甘孜庆“五一”·····	(23)
五、砍柴割草学藏文·····	(30)
六、喜事联翩壮行色·····	(37)
七、驾驭骏马育英雄·····	(41)
八、藏汉齐心护战友·····	(48)
九、行进在雀儿山下·····	(53)
十、战士歌舞奏凯旋·····	(60)
十一、汗浸雨淋岁月艰·····	(72)
十二、藏民运输有先功·····	(81)
十三、钱粮千钧系安危·····	(85)
十四、太昭扎营绘新图·····	(94)
十五、拉萨万众迎亲人·····	(98)
后 记·····	(104)

一、秣马厉兵出新津

一九五〇年，春天。

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季节。温煦的阳光，照耀着蜀中肥沃的土地。刚刚翻了身的贫苦农民，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，忙着栽插。解放了的人民，正向着美满、幸福的大道跨步飞奔。

城市上空，飘扬着鲜艳的红旗。每条街巷，都充满了欢悦的笑声。人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奔波劳碌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缝制戎装，蒸制干粮，准备给养。气氛十分紧张。

“要进军西藏了！”一个并不虚妄的传说牵动着军民的心绪。

我们这支南征北战的部队，已经投入了繁忙、艰巨的进藏工作的旋涡里了。战士们一听到这个风声，都兴奋异常，摩拳擦掌。西藏，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。藏族同胞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。他们有悠久的历史，丰富灿烂的文化艺术；他们对于伟大中华民族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对于伟大的祖国有着显赫的历史功绩。但是，近百年来，帝国主义屡次插手破坏，造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。他们策划过“西藏独立”的阴谋；煽动过反对祖国统一的情绪。十八世纪后半期，英帝国主义的罪恶足迹曾经踏进这块

地方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帝国主义又涉足进来。他们留给这块土地和人民的是灾难、贫穷、落后和分裂。

我们奉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，要去解放水深火热中的藏族兄弟，把革命胜利的喜悦带给他们。

我们的准备工作头绪纷繁，种类甚多。行装的准备，食物、药品、牛马的购集，印制文件，调配警卫员，都列入了议事日程。

一天饭后，我正在和作战科长一面交换意见，一面下棋休息，忽然门外一声“报告”，进来的是总务科长李从斌同志。他满怀兴致，把身后的一位年轻战士推到我的面前：

“准备工作又完成一件，警卫员找到了！”

“在哪找到的？”

李从斌同志高兴地答道：“在江边，你自己看看，是个理想的警卫员的材料！”

“嗯？”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。他脸阔眉浓，眼亮有神，个头虽然不高，但肩膀宽厚，体格健壮结实。两只有力的大手，半握着拳头，自然垂放在腿侧，头发浓黑，透着一股子虎气。我看着作战科长的表情，他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你怎么跑到江边去了，部队呢？”

他机警地立正，然后操着浓重的豫东地区口音回答说：

“报告首长，我是十八兵团二大队随营学校的战士。到湖南编为二野先遣队；到贵州说要下地方，做了鉴定；现在又说要向川西进军。在过赤水河到达四川叙永县的时候，因为急行军过度劳累，我脚肿了，得了病，被塞进了收容队……”

“掉队了？”

“嗯……是掉队了！病刚好，我就在追赶部队。我刚到

泸州，部队已进军到了川西。我正准备坐船渡江，就被这位首长‘动员’来了。”

李从斌向我说明了他所在部队的番号。

我马上告诉他：“你们部队也要进藏。我马上和你们首长取得联系，说你已经和我们‘俘虏’了。咱们一起进藏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那当然愿意。”

“可艰苦哟！”

“咱就是喝苦水长大的。干革命怕苦怕累还行！”

“要走几千里路哟！”

“几千里路算啥！从淮河边走到长江边，从北方平原走到西南山沟，咱可没叫一声苦，说一声累。咱这铁打的脚板钢铸的腿，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是准备走路的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李从斌流露出赞赏的神情。

作战科长眨眨眼，微笑着使劲吸烟。

“都会用什么枪啊？”我试探地问道。

“会用步枪。我在部队用的是‘双臂捷克式’”。

我摇摇头：“不行。不仅要会使用步枪，还要学会用手枪。要学会挨饿受冻，爬山崴水。不要象我，只会下棋。”我的话还未说完，已经是笑声盈室了。

“首长……”

“不要太拘束，以后咱们就是行军路上的老伙伴了。你离开我不行，我离开你也干不成事，咱们互相帮助，共同前进，怎么样？”

他高兴得眯着眼睛，频频点头。

我把一支德国造的二八驳壳枪交给他，他便成了我的警

卫员。我们都习惯地管他叫小郭。

那些日子，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繁忙紧张的。小郭跟着我，马不停蹄地找这家，访那家。跑得腿酸腰疼，累得热汗透身。我们向当时的泸州军管会主任王其梅同志请示工作，汇报情况。我们部队到川南还未喘过气来，马上又得打起背包、扛上干粮向川西进发。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伟大的目标——进军西藏。

我们部队驻扎在乐山的时候，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终于传来了。党中央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决定十八军进藏的命令正式下达。于是，整个驻地，士气沸腾；人们奔走相告，互相传送佳音。战士们虽然身居蜀地，可他们的心却早已飞到拉萨古城了。那是多么珍贵的时刻，那是多么感人的情怀！同志们都把祖国统一大业自觉地承担在肩，把吃苦尝辛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，有谁还想到路程的遥远，还畏生活的艰难呢。

命令下达的当天早上，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动员大会。那天，阳光灿烂，碧空如洗。和煦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红彤彤的面颊。我们聚集在广场上，歌声飞扬，笑语不绝。整个广场充溢着只有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才有的那种战前的浓烈气氛。

大会开始。十八军政治委员谭冠三同志在会上做了动员。冠三同志是我们十八军中的长者。他说话风趣，性格开朗，阅历丰富，久经沙场，威望很高。他那天显得格外精神，异常兴奋。他说：“党中央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，是对我们军的最大鼓舞和鞭策；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是我们的无上光荣；我们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，胜利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。我们进军西藏，也是在

替祖先还债，历代统治者一向实行歧视、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；我们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政策，一定要把旧西藏建设成一个团结、和睦的民族大家庭。”谭政委的讲话，激起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，把已经高昂的士气推向了顶峰。特别是当他宣布道：党中央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非常关心和重视我们，给我们调配了飞机，每个战士配备“一长（步枪）、一短（手枪）”、两双皮鞋，还有充足的给养时，会场上掌声雷动，欢呼雀跃。在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不久，祖国人民能够把这么多的物资调拨给我们，那真是件动人心魄的大事啊！

会议结束，军营欢腾，党团员接连开会。血书、决心书堆满政治部的办公桌，找政委、主任谈话，提申请的人络绎不绝。

条件改善了，我们又开始了更加繁重的准备。上级为我们调配一辆中吉普改装的旅行车。警卫员配有望远镜、卡宾枪、手枪，小郭显得威武而又精神。我们风驰电掣，不论朝昏，饿了嚼上几口糌粑；渴了仰起脖子灌几口水；困了就和衣在车上打个盹儿。由于跑得太急太累的缘故，我患了黑热病，被送进华西医院治疗。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，军首长张国华、谭冠三、陈明义、李觉等同志都亲往看望；许多同志来问寒问暖。警卫员小郭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坐卧不安。

有一天，我躺在床上，小郭焦切地站在床边，我好奇地问他：

“你好象心里很急？”

他爽快地回答：“急得要命。”

“急什么呢？”

“急什么？你的病要是老不好就糟了！”

“糟什么？”

“那就不能进藏了！”他蹙着浓眉，大声说道。

“进不了藏，咱们就留四川嘛！”我故意逗他。

“噢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就是人背马驮我也要把你弄到西藏！”

“好！”我心里非常高兴，“你给我买好文房四宝了么？”

“就是笔墨纸砚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买到了。咱们钱少，不能买高级的，也不能买中级的，只能买低级的。”

“你真会精打细算，当家理财。咱们现在家底薄，津贴少，就要这样过日子；将来待遇提高了，日子好过了，也要这样办。”

“你要的书我也买来了。”

“嗯。有了书，咱们路上就有事干了。”

在那硝烟刚散，征战尚急的年代，我们军队都保持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团结、乐观和诚实的作风。这是用阶级情谊、共同目标纽带在一起的上下级关系，是我们进军西藏，战胜千辛万苦的精神力量。革命队伍离开了它，就将成为散沙一盘，乌合一群。

一九五〇年冬，病愈之后，我急着要赶回部队。进藏大业压在肩头，有如千钧重量，谁还有心在外勾留呢！领导理解我们的心情，让我们坐飞机回归驻地。

解放之初能够坐上飞机，实在是一件新鲜事。时间没到，我和小郭便赶到了重庆白市驿机场。几架银色的飞机停在机坪上。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候机室。眼前的景象一下子把我们惊呆了：宋任穷、李井泉等首长均安坐靠椅，谈笑自若呢！他们发现了我们，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。听说我们是准备进藏的，就更加显得关切。宋任穷同志把我叫到身边，饶有兴趣地询问昌都战役的情况。

我把了解到的对方据江顽抗，不懂作战常识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。

宋任穷同志听罢，开怀大笑。他仰起头来，带着无法抑止的喜悦说道：“这说明他们不懂战术。自古以来，兵家所忌：一字长蛇，必败无疑，必败无疑！”

李井泉同志也含笑补充道：“这说明进军西藏是历史潮流：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谁想动解放军一根毫毛，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
接着，几位首长反复指示我们：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准备，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要保持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。首长的关怀和指示，使我们力量倍增。

西南局的领导同志，对我们进藏工作更是关心。贺龙同志曾经做过具体的指示：“我们这次进军西藏，在军事上打败他们是没有问题的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胜仗，做好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的工作。我们能够进去并站住脚，主要依靠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遵守群众纪律。总之，要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放在第一位。”他还要求进藏部队学习藏语，要了解、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，保证把最好的骡马、被服、用物、餐具配备给进藏部队。

时间流逝，军情紧急。转眼已到了一九五一年的初春。

这个时候，土地改革已经在全国大部地区胜利完成，人民政权已经普遍建立，经济恢复任务已经明确提出，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，进军西藏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。

为了贯彻上级指示，把进藏动员工作做好，我们及时召开了“后司党代会”。张国华军长在二月十五日做了重要报告。他说：

我们当前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，人们思想比较混乱，领导者要严肃对待各种思想；通过号召运动，发扬民主等方法发动群众，多谈党的利益。

把困难告诉同志们有好处。解决思想问题的对象主要是干部，而解决者也主要是靠干部。

我们已向毛主席发了电报，作了保证。我们对西藏要一面进军，一面建设。

西藏人口有百余万，那里物产丰富，粮食有余，但大部都集中在上层贵族手中。藏族多信喇嘛教。由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和反动上层的欺骗，老百姓对我们不够了解。

我们进藏要采取谨慎、缓进、稳步的方针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。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指出的“进军西藏，不吃地方”的政策办事。我们的运输要靠藏族群众，要团结各阶层人士一道工作；对宗教要注意保护，不可侵犯；购买粮食牦牛不能多，以免妨碍生产；要虚心听取藏民意见。

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，我们进藏队伍迅速组建完毕。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，但可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

其中有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，还有联络部，财经大队、运输大队。我们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是豫皖苏解放区的老兵，指战员多是那个地区的子弟。在艰苦的战争年代，他们长期活跃在豫皖苏地区，和那里的人民鱼水相依、休戚相连。豫皖苏地区的人民，用辛勤乳汁养育了我们的战士，我们战士和豫皖苏地区的人民结下了骨肉之情。祖国大地解放了，长期离散的亲人急盼团聚。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川南的乐山、安仁一带，原来准备长期移驻泸州。于是，亲人们便从四面八方奔向川南。有一位部队领导同志，因为连年忙于行军打仗，无暇顾家，爱人生了两个小孩，他连儿女的面容还未见过哩。他的爱人带着获得解放的喜悦心情和家乡巨变的喜讯，直扑川南。这是一位刚强泼辣的妇女。她坐上江船以后对同伴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！我从战争等到胜利，从北方追到南方，一直等，一直追，这下可算追到头了。”船到宜昌，她又听说部队要很快进军西康，后来又听说要进军西藏，急得直跺脚，愁得眼泪流。急是急，哭是哭，咱们部队的家属都有一股自觉的牺牲精神。她找到部队，向丈夫了解实情后，不仅把爱人送上了进藏的征途，就连她自己最后也成了进藏的一名光荣战士。这种为革命事业舍己忘家的事迹，在我们部队是难以数计的。

党中央和西南局为我们进藏做了周密而充分的安排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在承担着抗美援朝巨大而沉重的义务的情况下，仍然把我们必备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调来。海带、粉条堆成小山；代食品、蛋黄蜡罐头塞满仓室；军用帐篷、医疗药品，摆列庭廊；驮物的牛马，彼嘶此叫。整个营房洋溢着热闹而紧张的气氛。

我们留驻四川，队伍不断扩大。一些富有革命理想的男女青年，投入了我们的钢铁洪流。他们有文化知识，会唱歌跳舞，给部队增添了无限生机。一位“西藏通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。他叫邓明远。老邓是一位性格活泼、身体精悍的中年男子。他原是国民党政府西藏办事处的普通工作人员，由于不满其政治的腐败，又受西藏地方政府的排挤，一气之下，他便弃职归乡。如今看到我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，便主动申请参军进藏。他熟悉藏族风俗，会讲藏语，成了我们理想的藏语教师和得力的翻译。当时参军的还有一位叫杨沛坚的同志。他是工程师，穿上军装的时候，他已是三十四岁的人了。他平易近人，没有架子，又懂设计，还会施工，围棋下得也不错。我们的部队是个大熔炉，也是个群英荟萃的大学校。我们这支队伍象鼓满劲风的巨大帆船，起程的日子就在眼前。

出发之前，我们召开了规模宏大，气氛热烈的动员大会。四川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送别讲话。会后，当地政府和人民送给进藏战士每人一件纪念品：杏黄绸布上面印着鲜红的字迹，“赠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”。绸布一条，重如千钧。战士们都把它视为最高的奖赏，始终把它放在贴心的地方。

一九五一年四月八日，夜色未褪，曙光刚露，我们的营房军号响亮，歌声豪迈。战士们吃完早饭，整好行装，准备登程。附近的老乡、地方的领导、部队的亲眷，围得里三层、外三层。鸡蛋、粑粑、水果把战士们的口袋塞得胀鼓鼓的。这时，红日高照，光华满天，我们进藏队伍，分乘十五辆军用卡车，浩浩荡荡地辞别了新津，踏上了艰苦的行程。

二、攀崖凌险翻二郎

风尘仆仆，行色匆匆。这八个字就是我们踏上征程的形象写照。军到雅安之后，城市状貌未得全顾，沉沉一睡，第二天拂晓，便乘黑又踏上行程。部队赶到天全，已是烈日当空。气候闷燥。邓明远一面擦汗，一面回答着战士们提出的问题。杨沛坚同志不住地讲解着山的构造，界的形成。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。女同志轻声吃力地哼着歌子。对于她们，仿佛行程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。老同志嘴里叼着自卷的香烟，有滋有味地抽着，低着头，微弓腰，他们可会积攒力气。军出天全，便开始爬山了。川西高原，群峰纵列；这里山高谷深，岭谷交错。爬着爬着，突然在深谷之上，偶见一座竹索桥高悬空中。桥下流水湍急，哗哗作响。壮丽雄险的山峰，欢快奔腾的河水，构成一幅美丽多姿的画面。我们的老红军王兴友同志激情难抑，言语如珠：

“嗯。美！妙！这般景色，这样军队，怎不使人感慨多情。就连我这不写诗的人也想吟咏两句呢！”

说罢，他清瘦的面庞荡着笑意，拍去身上的灰尘，整理一下简朴的军装，凭依竹索桥头，大声地对我说：

“摄影师，来！给我留个纪念。”

战士们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新奇而又高兴，有的学着摄影

师的样子，笑着说：

“嘴张大点！”

“再张大点！”

正当兴友同志张嘴凝笑之际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他那飞扬的神采完全印留在胶片上。中午时分，我们到了高山上的一個小镇——滥池子。它名义上是个镇，实际上只有几间草屋，参差地蹲踞在山脚下、土路旁。房屋附近，零落地长着几棵树木。昔日这里是一个荒凉寂寥之所。进军西藏的宏伟事业，也给这个小镇带来了无限生机。一个汽油库正在这里动工兴建。当时虽然尚属春夏之交的季节，但中午的阳光已是焦灼似火了。我们的指战员为了早日完成进藏任务，正挥汗如雨，拚力苦干。他们有的赤着肩膀，有的穿着汗浸的衬衣，扬镐挥锹，挑石运土，欢歌笑语，穿梭来往，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色和乐观精神。

翌日八时许，我们的队伍辞别了滥池子，开始翻越行军路上的第一道险关——二郎山。

二郎山的确名不虚传。远远望去，它峰插云霄。那闪闪发亮，好象宝剑锋刃一般的，是高山积雪清光；那郁郁森森，宛若绿碧的环带的，是草木的繁茂景象；那犬牙交错，裸露着黄褐颜色的，是崖石的凶险模样。

我们开始爬山了。

部队有次序地蜿蜒前行。张国华同志的车子在前，谭冠三同志的车子居中，我们的车子镇后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吃力地爬着，爬着。战士们艰难地攀登着，喘着粗气。险峻奇拔的山峦，不时引起战士们的惊叹和欢呼。整个上午，我们都是峡谷高山之间钻来爬去，打着转转。傍午，神奇的景

色便豁然展现眼前：大团大团的白雾，象乳白的轻纱，遮住了野草、树木和峰峦，就连我们行进的车辆，也只听见它的马达声，而看不清相距不远的车身。约摸过了一小时左右，雾障散除，两旁白雪覆盖的山峰又出现了。山下碧波掩映，山顶白雪交辉。这对我们这些多数生长和战斗在大河上下、淮河两岸的战士来说，真是罕见的佳境。我们一面指划着，一面感叹着。

正当车吼人欢的时候，部队突然停止不动了。不一会儿，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道：“前面塌方，无法通过。”

军首长走下车来，伸伸疲倦麻木的胳膊和腿脚，然后便坚定地向前走去。他们慰问了修路的战士，察看了塌方的情景，又沉着地稍事思考，然后果断地一挥手：

“立即抢修！”

在公路旁边，我们集合起队伍，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，要求大家协助筑路部队，排除障碍，修补塌方，保证公路畅通无阻。

一声令下，全队雀跃。指战员们不顾旅途的疲劳，忘却了腹中的饥饿，开山采石，就地取材；挖的挖，抬的抬，灰尘扑面，泥土满身。老同志率先催范，专拣大块石头搬；小战士精力充沛，尽挑累活干。女战士表现更为突出，她们有的扎着小辫，有的剪着短发，虽然力薄身单，但干起活来却分毫不让。有位朱琳同志，那可是个泼辣、能干的女同志。她踏上路程，便背起三十多斤的行装，走起路来“噔噔噔”的异常有劲。她一甩掉背包，把头发一理，便奔跑如梭地挑筐抬土，搬石运渣。她始终是大家称赞的人物。

我们正在紧张地干着，忽然战士们围成一群哄闹起来。

我们过去一看，原来又在跟两个大学生开玩笑呢！

这两个大学生是我们部队引人注目的角色，男的叫戴宜生，是人们善意戏笑的对象。

“哟，大学生挑担子姿势真美噢！”

戴宜生也习惯地用四川话挑逗着：“咋个，姿势咋个的嘛？”

“象摆船咧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”，一阵大笑。

“人家干活不要取笑嘛！”

“再取笑可要哭了。”

“哪个龟儿子哭了。”

“噢，眼泪都淌出来了。”

“是么，我怎么不晓得呢？”

“那两块反光镜遮住了。”

“谁给擦呀？”

“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……”

宜生同志的爱人马上抡起镐把，吓唬着追过去，人们一哄而散，笑声洒满山谷。

经过一百多分钟的奋力抢修，塌方始平，公路又通。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我们的队伍又继续向顶峰迈进。

在沉闷的轰轰吼叫声中，汽车大概又爬了二十余里，我们终于到达二郎山的最高处。山顶：白雪铺地，浓雾锁罩；冷风习习，气候奇寒。时令虽是初夏，但我们好象又进了隆冬季节。战士们欣赏着夏季的雪景，身上打着冷颤。寒冷的气候怎么能闭锁住战士们胸中的热情呢。他们冒着严寒，淋着细雨，赞叹着陡峭如削的山峰。翻过顶峰，汽车沿着盘山

路曲转回旋，飞驰而下。每过一个沟坎，都会引起一阵喧闹和惊叫。

不多时，忽然又云消雾散，艳阳高照。近处那青翠欲滴的树丛，山下那蜿蜒呼啸的泸定河，已豁然在目了。这样的瞬息巨变，如此瑰丽的景色，怎能不让热爱祖国河山，渴望祖国统一的战士动思牵魂呢！

午后，我们滞留在泸定河边的一个小城，匆匆吃完了饭，同志们便自然地涌向大渡河上的铁索桥了。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事迹，毛主席咏唱千古的壮丽诗句，在战士们心中翻腾着。它是策励我们不畏艰险，奋勇进军的力量。

大渡河水深流急，浪花飞溅，沿谷而下。铁索桥横架谷上，显得高森肃穆。偶有几个藏民，攀附铁索，泰然走过，和我们热情地点头示意。

铁索桥头，矗立着一块很大的碑石，据传碑文是康熙的手迹。因为年岁久长，再加上风打雨浸，字迹已经模糊难辨了。但是那段历史在人们心中却是异常真切的。

我们回到驻地，夜幕已经降临。山中小镇别有一番风姿。重叠起伏的山峰，犹如黛色的波澜；略带凉意的晚风，在房屋上打着唿哨。我们的战士是天生的乐观者。他们打河水洗漱，拣柴草做饭；在高地上架起帐篷，抖开被包。有的战士在地铺上打滚嬉闹；有的则在吱吱哇哇地跟邓明远同志学习藏文。不知是谁，用清脆的嗓音，朗诵起气势磅礴的《长征》诗来：“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……”声音传得很远，很远……

我们在铁索桥边度过了难忘的一夜。